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四)

编辑组编译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的思想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MAO ZE DONG'S THOUGHT BY STUART SCHRAM



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的思想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部编译

（内部发行）

毛泽东的思想

MAOZEDONG DE SIXIANG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编辑组编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1740信箱)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8.75印张 200,000字

00,001—10,000册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3-0037-4/C·5 内部发行 定价 4.70元

丛书出版说明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论著。

为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状况和动态，为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对外宣传中有针对性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定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供有关研究人员内部参考。

这套选辑以丛书形式出版，主要选编有学术参考价值的资料；以提供原始资料为主，其中既有专著，也包括论文汇编；既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形式根据编选内容而定，不强求一律，编者只作必要的编辑和评注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力求比较客观、系统地反映国外多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希望能够起到开拓理论视野、扩展思维空间、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本丛书编辑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主持，并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以合作方式参加工作。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86年10月

编者的话

差不多两年前，施拉姆教授访华期间，给我们带来了他的新著《毛泽东的思想》的原文清样。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筹划本书的翻译工作。去年，此书的英文版和日文版相继问世。现在，中文译本也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是国内理论界熟悉的学者和朋友。他长期从事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执教，并任该校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据悉，施拉姆教授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持《毛泽东集》英文版的编纂工作。

施拉姆教授撰写的政治传记著作《毛泽东》已作为本丛书第一辑出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实际上可视为《毛泽东》的姊妹篇。在这部著作中，施拉姆教授依据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汲取消化新的文献史料和观念，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对毛泽东一生的道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杰出的贡献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来源于历史，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现代中国历史离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现实之中，运用到中

国的历史遗产之中。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论目标就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毛泽东理论活动的基本轨迹,也是把握其思想的主要线索。

施拉姆教授认为,随着革命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实施过程分为各个不同阶段;就基本原则和整体而言,毛泽东的思想是连贯的,但也存在着断裂和矛盾,这种转折主要表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片面夸大上层建筑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的倾向,片面夸大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倾向,开始在毛泽东的思想中逐渐发展起来,使他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

施拉姆教授虽然指出这种倾向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观念之中,但他并不赞同把“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说成毛泽东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高阶段或顶峰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导致这些失误的观点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矛盾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在许多方面否定了自己正确的东西才造成了这些错误。因此,尽管这些错误证明了毛泽东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已经过时。施拉姆教授在结束语中特别指出,中国现在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观点虽然与毛泽东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丝毫未变: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努力保持中国的特色。在施拉姆教授看来,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精髓所在。

施拉姆教授的这些观点,从总体看,是应当赞许的。

与同类其他著作相比,本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考察问题的角度比较接近全面。这表现在其一,不把

毛泽东的思想看成是单线过程。作者在把握和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时力求把它视为一个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趋向,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传统文化和外来理论、心理和性格等多个侧面进行分析。例如,作者对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的思想转折的描述就是这种分析方法的尝试。其二,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本身是由多种对立因素构成的辩证统一体,因此,在叙述毛泽东的某个思想时,他尽力揭示出相互制约的各个侧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些著作中常见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倾向,使其分析比较接近于毛泽东的思想原貌。

第二,注意做一定的具体分析。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往往多是针对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的,如果脱离具体的条件和背景做抽象的分析,就难免发生误解。施拉姆教授在本书中虽然没有以很多篇幅叙述这种条件和背景,但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是努力在具体的环境中理解毛泽东的观点的。其二,中国革命是个复杂曲折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不可能是个单向过程。即使在分析毛泽东出现重大失误时期的思想观点时,施拉姆教授也能比较注意不作简单化的结论,而是依据文献史料指出毛泽东的积极贡献以及为纠正自己的某些失误而作的努力。

第三,根据新掌握的资料和进一步的研究修正原来不准确的观点。例如,在《毛泽东》一书中,施拉姆教授曾认为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尚未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有关文字是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增补的。而在本书中,他明确否定了把毛泽东视为“农民革命家”的观点,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证明,

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信奉党是先锋队的思想。又如，在《毛泽东》中施拉姆教授曾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农民反对工人、农村反对城市的运动。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人们对当年那场大动乱掌握了较多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本书中，施拉姆教授也放弃了这种不准确的想法。这类修正和补充还有多处。这都反映了施拉姆教授在总体上的较为严谨的治学态度。

将本书与《毛泽东》比较，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向前深化了一步。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例如，施拉姆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是中国共产党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过程中提出的一种说法，尽管它不够准确，但其实质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能否认，施拉姆教授在借用这一说法时也吸收了类似的思想，但是，他在这一命题中所强调的因素却是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于是，他所理解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就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要求相结合。当然，毛泽东一贯重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工作，并努力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带有民主性的精华，但这毕竟不完全是毛泽东理论贡献的实质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误差，使施拉姆教授把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当成毛泽东的思想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并把二者的相互关系及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作为解释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依据，这当然难免得出失实的结论。他企图从道教“阴阳”辩证法中寻找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思想根源，从强调国家教化职能的传统政治观念中引

申出毛泽东晚年夸大上层建筑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就说明了这点。此外，本书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若干史实的叙述和对毛泽东的思想的革命分析也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中无不夹杂着作者的某种倾向。一些说法可能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诸如此类的问题，相信读者会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在此不一一赘述。

以上看法仅是在编译过程中形成的点滴印象，未必妥当。作为本书中译本的编译者，我们真诚地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够给国内理论界同行带来一些新的信息。

本书是根据作者提供的稿件清样翻译的，尔后又参照英文发排稿做了校订。书中所引文献资料，凡有中文版本的，均以中文版的文字为准进行核校，并只注明中文版出处；无中文版本的，均按原文译出，注原文出处。原文的脚注，一律改为章后注。对于书中史实的不准确处，没有逐一以编译注的方式指出，希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订和编审工作。石仲泉和张宁负责本书的编审工作。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按姓氏笔划排列，下同）：田松年、刘晓、李宗敏、张宁、张爱茹、杨德、杨凤城、武市红、高路、徐素华、萧延中和阎润鱼。参加校订工作的有：马芷荪、邓曼、陈铭康、张宁、张爱茹、武市红、施肇域、梅柏翠和潘维洛。具体编辑工作由张宁、张爱茹和武市红负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990年2月

給中國讀者的序言

中央文獻研究室把我另外一本書，翻譯成中文，我特別歡迎。毛澤東思想這個課題顯然在中國還是很重要的課題。怎樣瞭解毛澤東的遺產？我這個外國人所寫的书不會適當的回答這個問題。不過雖然很淺薄也許會引起一點興趣。請中國學者批評指正。

施拉姆一九八九年五月於北京

给中国读者的序言

中央文献研究室把我这一本书翻译为中文，我特别欢迎。毛泽东思想这个课题，显然在中国还是很重要的课题。怎样了解毛泽东的遗产？我这个外国人所写的书不会适当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虽然很浅薄，也许会引起一点兴趣。请中国学者批评指正。

施 拉 姆

1989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给中国读者的序言(影印件)

绪 言	(1)
导 论	(6)
第一编 1949 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	(22)
第一章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	(23)
第二章 党、军队和群众(1927—1937)	(58)
第三章 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1937—1940)	(82)
第四章 毛泽东的思想的胜利(1941—1949)	(112)
小 结 走向现代独裁的人民民主?	(120)
第二编 1949 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	(126)
第五章 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统治方式	(129)
第六章 毛泽东探索一条“中国道路”	(164)
第七章 中苏分裂的因与果	(190)
第八章 “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	(222)
小 结 寻找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241)
结束语	(252)

绪 言

这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为《剑桥中国史》第13卷撰写的论述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的思想的一章，另一部分是我为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5卷撰写的论述从1949年到1976年的毛思想的一章。虽然我做了一些编辑方面的修改，但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要随意更动全文、尤其是本书的第一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其结果是，随之而来的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对其观念的分析和评价。尽管一有可能我就尽力把这些观念同阐述它们的环境联系起来，但是，在原书的体系中以很大篇幅讨论其他各章已经论及的事实，即使是那些对毛本人思想发展肯定产生了影响的事件，也是不合适的。

专为本书撰写的导论和结束语就是意在弥补这种种省略，并把毛的思想及其发展置于一个较大的框架之中。导论首先讨论了毛试图驾驭的中国20世纪革命变革过程的性质问题，以及使他得以扮演其角色的种种因素。然后，导论考察了毛生活中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其思想的各个转折点之间的关系。至于结束语，其目的不在总结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主要原则，而是要对它在中国持续不衰的意义作出估价，并预测它今后在一个有些人声称正在发生“非毛化”过程的社会和制度中的位置。

我并不认为本书十全十美，要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做出确

切的说明,它还有缺陷,但是,它的基础是我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做的研究工作。本书究竟是否把我所做的解释向前推进了一步,这要由别人来判定。无论如何,我多年从事毛的思想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我已经欠下了很多人情,在这里向他们致以谢意,对我来说是一项非常愉快的使命。

履行这一使命,最好从头说起。在这个领域中,我最早发表的一篇专题论文是翻译和分析毛在1917年的文章《体育之研究》。这时,我受惠于埃丁纳·巴拉兹的鼓励和批评。在60年代初期,我承蒙特许参加他在巴黎举办的讲习班。此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度过了一年时光,它使我有机会萌生纵观毛的思想的最初念头。

在从事这一工作的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个人向我提供了帮助,详细情况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的致谢辞中已有说明。这些人中有三位最为突出。当时的中心主任费正清,以他独具特色的热诚与严谨并济的方式,主持了这些研究活动。我与本杰明·施瓦兹同窗一年的时间里,他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向我提供了思想上的激励。胡佛研究所东亚资料馆馆长欧根·吴给我以便利,使我初次接触到延安时期的材料,从而帮助我打开了依据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著述文稿研究其思想历程的大门。

1962年夏,当我在胡佛图书馆阅读《解放日报》时,我还不能想象,尔后我竟能结识该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于光远、李锐、廖盖隆和温济泽。这一事实是此后发生的世界政治变化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变化的象征。到1963年,在资料方面和极有价值的观点交流方面,我就已经不仅得益于欧洲人和美国人,而且得益于日本学者和各个图书馆了。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思想研究方面,

由于竹内实主持的十卷本《毛泽东集》的编辑工作，日本人的作用大大增加。无论如何，非常之多的材料在中国本土之外很难得到，如果不是这套既包含公开版本又收入内部版本的资料自1978年以来广泛出版，与今天的情况相比，我们关于毛的思想的知识肯定会支离破碎得多。80年代初出版的东京版《毛泽东集》增补本由九卷文稿和一卷索引组成，它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印制的内部文集。

除了有机会查阅见诸文字的文献之外，我曾得到特许六次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这使我对毛的生平和思想获得了全新的视角。1980年6月至7月、1982年4月至5月、1982年9月、1984年3月至4月和1986年3月至4月的访问是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接待的；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的访问是由哲学研究所接待的。我曾与之讨论这类问题的中国学者和政界人物的名单太长，在这里难以一一列出。本书的注释中说明了他们对某些事实或解释所给予的指正。

特别要表示谢意的是马列所前任所长于光远（1982年5月离职），还有1982年5月以前担任副所长的冯兰瑞和廖盖隆，哲学所所长邢贲思。他们和他们的同事们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同我谈论与毛泽东思想有关的问题，对我的解释（包括本书各个部分的草稿）作出评论，组织研讨会，安排会议，接触资料。在同龚育之和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事们的多次交谈中，我也得到很大教益。无需说明，这里提及的诸位都不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负任何责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交流，我的解释肯定相当肤浅。

我所以能有这些机会，当然也要感谢曾资助我访华的机构：不列颠研究院，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该机构推荐我参加与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联合交流项目，并为我的旅行支付费用；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访华期间，它提供了慷慨的款待和帮助。同样，全国人类基金会为我在1980年夏参加“北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代表团”出资赞助，这是我与中国学者接触的第一次关键性的一步。为了从事本书的研究工作，我曾多次访问日本和美国的图书馆，我得到了东方和非洲研究所的财政资助。

在过去的十年间，同与中国接触一样有价值的是中国之外的同事和朋友们对我表现出来的善意，向我提供的教益，从他们那里，我得到源源不断的鼓励，并在查清资料来源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

关于资料，特别要感谢两个方面的帮助。一方面，竹内实、中村公义和其他合作编辑《毛泽东集》的日本学者向我提供了许多关于1949年前后毛的思想的重要文献汇编。另方面，最近收集到许多册毛著述内部版本的哈佛—燕京研究所允许我查阅其资料，并复制了一些关键性的文稿。我从这一来源获得的资料有毛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未经修改的原文记录稿，还有他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后面将会看到），它们在我对1957年至1958年间毛的思想的解释中起着中心的作用。哈佛大学将以《高潮中的毛泽东》为题出版同一汇编的译本，并附有注释性的文章。本书付印时我尚未看到这一对“大跃进”期间毛的思想的集体评价，但是我要再一次感谢欧根·吴，现在燕京研究所的图书馆馆长，他给我提供了把这些重要材料收入我自己所作分析之中的机会。

我要感谢《剑桥中国史》的编辑们，构成我这本书骨干的绝大多数章节最初都是为《剑桥中国史》撰写的，其篇幅也并不小。《剑桥中国史》第14卷和第15卷的合编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

尔对我关于1949年以后毛的思想的讨论进行了极为认真的阅读和批评,并对文稿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富有教益的建议。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出版前,总编费正清就我写的那一章作出了有10页纸的评论,诙谐、透彻而又公正,他对本书1949年以后部分的内容和形式也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最后,我希望向组织和参加许多讨论我对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毛的思想的解释的研讨会和其他各种会议的人表示感谢,在这些场合,我的解释受到批评,这种批评总是很尖锐,但却有助于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多年来,在欧洲(从伦敦、爱丁堡、阿伯里斯特威斯到巴黎、威尔士和那不勒斯)、在亚洲(从德里、北京长沙和湘潭到东京和京都)、在北美的许多地方(从伯克利、斯坦福和圣迭戈到波士顿、纽约,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我曾多次获得这种机会。这中间涉及到的机构和个人数不胜数,难以一一列举。同我交谈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到遗憾,我似乎没有从同他们的对话中学到本应学到的那么多东西。当然,这方面的过失全在于我,正如我要为所有的错误和缺欠负责一样。